UMAC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MUSEES

2016 年 第 8 卷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2016 年 第 8 卷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在线期刊，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的会议论文集发行。

Editors
Nathalie Nyst
Réseau des Musées de l'ULB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 CP 103
Avenue F.D. Roosevelt, 50 1050 Brussels Belgium

Barbara Rothermel
Daura Gallery - Lynchburg College
1501 Lakeside Dr., Lynchburg, VA 24501 - USA

Peter Stanbury
Librarian of the Australian Society of Anaesthetis
8th floor, 121 Walker Street, North Sidney, New South Wales
2059 Australia

Copyright © International ICOM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http://umac.icom.museum

ISSN 2071-7229

Each paper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UMACJ（中文版）

策　划 / 刘绍学　郭　骥
翻　译 / 陈力子
审　译 / 肖福寿
编　审 / 刘志强　郁　慧
排　版 / 王　路
校　对 / 顾　叙

上海大学博物馆
中国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200444

UMACJ（中文版）获得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授权

项目得到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上海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支持

成立于 1611 年的圣托马斯大学（Pontifical and Royal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是亚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在这件银质铃铛上，刻有当时的大学印章和 1684 的年份。这件文物原来用作传统口语考试中宣告考试结束的信号。当主考官摇响铃铛后，学士或博士学位委员会的三位主考人即对学位候选人进行投票。这件铃铛是圣托马斯大学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尺寸：高 12.5 厘米，直径 7.0 厘米

大学博物馆再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国际博物馆协会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

第 15 届会议论文集

2015 年 5 月 11—14 日，马尼拉

目　录

Brunecky, Jessica:
吸引千禧一代的年轻观众：案例研究

Verschelde, Dominick; Dominique Adriaens:
UMAC — TFT^2：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教学工具的“特派组”

Chang, Yueh Siang:
大学博物馆：教学之外的意义

Livingstone, Phaedra; Hartz, Jill; Rothermel, Barbara:
大学博物馆对争议性话题的探索

Kuek, Michelle:
策展实验室：一个策展项目的案例研究

Suratissa, Dissanayake M.:
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苏瓦市纳塞塞海岸的斐济群岛海岸收藏的案例分析

吸引千禧一代的年轻观众：案例研究

Jessica Brunecky / 文

千禧一代（Millennials）的观众在文化机构、文化活动和博物馆互动等方面的观念，都与前几代的观众颇为不同，他们也是目前在大学校园里最庞大的群体。然而有的大学博物馆将来自校园外的观众视为主要的观众群体，忽视了校园内的学生，甚为本末倒置。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博物馆与自然历史博物馆（University of Colorado's Art Museum an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采取了不同举措，在吸引学生群体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概述

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千禧一代是一批独特而重要的观众群体。本文旨在从有关千禧一代的研究中提炼出适用于大学博物馆的观点，包括他们特有的文化消费行为，以及他们对博物馆普遍持有的排斥和疑虑的态度，等等。通过本文援引的两则案例，分析了公众博物馆是如何吸引千禧一代观众的，这些经验很值得大学博物馆参考借鉴。本文还介绍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博物馆，分析了这座博物馆是如何设计各种活动，以便更好地适应千禧一代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其他大学博物馆，在未来通过潜在的展示方式，更有效地吸引大学生观众。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则介绍了对于未来的展望，以及如何满足为“Z 一代”（Generation Z，即新新人类，2000 年后出生的人群）到来的需求准备。

作为观众的千禧一代

千禧一代，是指出生于 1981—2000 年初的人群，是如今大学校园里学生的主流群体。这一群体追求专家级别的文化内容呈现方式，敢于挑战体制机构的权威性。他们嗜好一种包罗万象式的文化参与方式，渴求一种共同创造（co-creation）和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的过程（Pew Research Institute 2014）。最近的研究表明，千禧一代正逐渐远离传统的社会体制，越来越少参加各类宗教和党派政治活动。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怀疑现有社会体制，认为这种体制过于庞大，已经过时。因此，博物馆必须与时俱进，自我改良，以便避免不知不觉间成为这种不信任感的受害者，避免陷入观众流失、未来无望的境地之中。

如今的观众群体喜欢高端的文化消费，比如参观博物馆，观看大型演唱会，等等，但这种消费颇具随意性。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参与的是“包罗万象式的文化消费”（Peterson & Rossman 2008），因此文化机构必须重新考虑自身定位，以便更好地面向这批观众。这种消费的转变让博物馆陷入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的直接竞争中，但也为博物馆带来树立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化产品的机遇，使我们可以通过强调自身优势来凸显与其他休闲娱乐形式的区别。

除了文化消费的转变外，千禧一代对博物馆的疑虑很有可能让他们现在和未来都无法与文化机构进行互动。这一问题也是大学博物馆必须思考的。2006 年梅森（Mason）和麦卡锡（McCarthy）的研究指出，千禧一代将博物馆视为一处正式的、说教式的学习场所。博物馆的教育通常呈现出从专家到学习者这样一种单向信息流动形式，具体表现在“墓碑”式的展品标签（tombstone object labels），尤其是传统的专家讲座。这种“正式学习场所”的印象或许无法让千禧一代将参观博物馆作为休闲娱乐的活动之一，而且这种一本正经的信息流动也不再契合千禧一代接受高等教育时的体验，因为，21 世纪的大学教授和课堂早已开启了合作式的学习模式（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dels）。

为什么我们要在意?

典型的博物馆观众群体正在减少，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千禧一代的规模，都已超越了前一代的观众。他们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收入也更高，婚恋生育都比前代推迟许多，这些特性让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为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支持者。这一代人迫切需要文化方面的追求（Bresman 2015）。因此，如果博物馆能够成功地让他们走进并参与博物馆的活动，他们将会成为文化的引领者，艺术和文化的倡导者。

博物馆需要投入极大的努力，才能与观众保持长久的联系。大学博物馆有机会接触到大批千禧一代的人群，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博物馆的使命，也有利于培养博物馆的终身爱好者和文化支持者。然而，这也将大学博物馆带回到一个常见的悖论难题上。正如 2012 年夏皮罗（Shapiro）等人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所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为了追随公共博物馆的脚步，许多大学博物馆尽心尽力地为家庭、终身学习者和捐赠者们服务，却忽略了就在博物馆门外的学生群体。

博物馆必须做出改变。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给博物馆的支持日益减少，这一现状令人担忧（Hinz, et al 2013）。博物馆要顺应这一趋势，就必须不断地向广大公众呼吁，要求他们给予文化事业支持和帮助，其中包括经费上的资助。千禧一代的规模庞大，赚取财富的潜力也非常大，他们势必成为未来文化机构多种渠道的支持源泉。

为千禧一代设计活动

大型公共博物馆在为千禧一代观众设计活动方面，已经走在了前沿。

加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每周开展的“夜生活”（Night Life）项目（http://www.calacademy.org/nightlife）以及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每月的“无题”（Untitled）项目 （http://denverartmuseum.org/untitled-final-fridays），是两个极佳的案例。自从 2000 年代中期这两座博物馆开展此类“业余时间的博物馆”（museum after hours）项目以来，不少博物馆也设计了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以下的共同点：

1. 活动时间定在工作日朝九晚五时段之外，让千禧一代能在放学或下班后参加；

2. 成功地营造出轻松的社交氛围，让人们能够观赏到来自地方音乐人的现场表演或知名 DJ 的演出；

3. 以“动手实践”作为特色，让参与者在亲自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探索出非正规的学习（informal learning）途径；

4. 搭建吧台以活跃社交气氛，有时甚至为博物馆的活动举行鸡尾酒会。

这些活动让人们觉得，参加博物馆的活动就如同晚上出去玩乐一样，其关键在于博物馆还会提供教育性的内容。这种在博物馆享受的晚间娱乐与其他休闲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博物馆的收藏、展览和策展人为观众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博物馆的活动会根据不同内容而变化，会选择独特的主题，会最大化地利用策展人的专业知识、学术研究，以及个人对于展览内容的热忱。千禧一代迫切需要获得专家和策展人的知识，但他们却不愿意参加正式的讲座。上述这些活动则将策展人置于一种非正式的、社交的场合内，让千禧一代与策展人的交流变得像在和朋友们玩乐一样，让他们能在随意交谈中获取知识。这种随意的对话氛围也让博物馆变得更有人情味，让观众对博物馆的印象具体到了某个人、某个名字上。一旦提到博物馆，他们想到的不再是一个官方的、冷冰冰的机构，而是活生生的、热络的音容笑貌。

博物馆也知道，某些类型的活动和项目是难以引起千禧一代的兴趣，例如与大学课堂极为相似的正式讲座（Brunecky 2010），除非是教授布置作业要求参加，否则很少有学生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听讲座。如果是出于完成任务的目的而迈入博物馆的报告厅，这就会加深千禧一代对博物馆的反感情绪，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地，传统的博物馆讲解导览属于单向信息流动，这也无法满足千禧一代的需求，他们渴望的是共同参与和创造。另外，活动的设计还很讲究时机。如果活动安排在白天，这可能会与观众的工作、学业安排产生冲突。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作为美国顶级的研究型大学，迄今已培养出 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等。这所大学非常重视传统的“STEM”学科，即理科（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科（Engineering）和数学（Math）。该校拥有 3 万多名学生，校园内分布着 4 座不同的博物馆。科罗拉多大学还是一所“禁酒”学校（alcohol-free campus），校园内禁止售卖酒精类饮料，这就意味着无法在大学里开设酒吧或组织鸡尾酒会，来为千禧一代观众创造随意的社交空间。

1. 自然历史博物馆

科罗拉多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University of Colorado’s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建于 1902 年，1937 年起迁至现在的馆舍建筑内。博物馆藏品涉及古生物学、生物学、植物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藏品数量高达 450 万件，保存在 3 座建筑内。2008 年，博物馆启动了生物学展厅的拆分再设计项目。该展厅的陈列设计已有 45 年的历史，一直不变。通过对年轻观众的调查与分析，该馆实施了名为“生物会客厅”（BioLounge）的再设计项目，希冀用一种非传统、非线性的随意方式来吸引千禧一代的学生群体。项目实施前，博物馆的馆长帕特里克·科乔维克（J. Patrick Kociolek）与馆员们进行了几轮讨论。他对这一转型的初始概念进行阐释：“邀请学生们来坐一坐，喝一杯饮料，与朋友聊聊天，或是查查邮件。通过社交软件的互动，顺便也可以看看展览。展厅内不提供完整的‘故事’或是展品说明信息，而是让观众走近展品并与之互动，让他们自己构建独特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展览其实就是一种‘反展览’（anti-exhibition）。”（Kociolek 2015）

除了改变观众走近展览的方式以外，自然历史博物馆也调整了策划、设计展览的方式，允许任何馆员为展览出谋划策，无论他们是策展人与否。作为馆内助手的研究生和本科实习生，他们的展览创意也可获得采纳，这就实现了由千禧一代为千禧一代设计展览的目的，彻底转变了策展形式，为吸引千禧一代的学生观众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效果。

“在展出期间的前两年，参观的学生人数从以前三年间的平均 2 674 人次跃升至 2009 年的 8 603 人次；到 2012 年，全年参观学生数已达到 15 710 人。‘生物会客厅’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参观人数上，毕业季时学生们还把家人带到这个他们度过许多时光的展厅中来，这一现象也说明了项目的成功。”（Kociolek 2015）

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在继续努力，不断改进这种“反展览”的展出模式。该馆最近聘请了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作为“博物馆大使”，在馆内与千禧一代的同龄观众对话，搜集信息，了解博物馆如何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并努力为博物馆提供极为重要的见解。

2. 美术馆

科罗拉多大学美术馆（University of Colorado Art Museum）于 1939 年建成，其初衷是为教学服务的。美术馆的收藏曾经一度充斥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古生物学展厅。目前的美术馆于 2010 年落成使用，馆内拥有五个展厅和一个收藏研究中心，藏品可供师生学习和研究。美术馆收藏有 8 000 件藏品，涵盖了人类一万余年的历史，代表着世界各地的文化。以前美术馆曾是一座典型的传统博物馆，展厅陈列着当代艺术，厅内到处都是“墓碑式”的说明牌，很少出现展品的阐述或背景的诠释。展览空间则由白墙组成，整体给人一种诊所般的感觉，而针对学生的展览策划和活动设计也少之又少。

2014 年，美术馆开始进行转型，将学生群体视为主要观众。通过观众调查，该馆了解到：要吸引学生群体，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具有休闲感的空间，让他们流连忘返而不是过门不入。于是，美术馆就开始设计各种动手活动，为学生创造与美术馆积极互动的机会，摒弃了那种被动接收信息、聆听说教式讲座的学习方式。美术馆的馆员也主动出击，与学生会、学生社团和学生工作处一同探索与美术馆的合作项目。

美术馆协同大学咨询与心理服务部门，在展厅内开展每周一次的免费冥想会，时间定在每周五中午课间休息时段。美术馆还与一个学生社团合作，每两周开展一次活动。他们利用课余闲暇时间，在馆内教育活动室为非美术专业的学生开设人像绘画课程。正像自然博物馆“生物会客厅”一样，前来参加冥想会和人像绘画课程的学生很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其他时间也来造访美术馆，参观展览。

未来将会如何?

上述各种与学生深入接触的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千禧一代广泛的兴趣，科罗拉多大学校园内的博物馆已启动了各种合作项目和协同展览，借此提升博物馆在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度，以期在这个以“STEM”为主的校园里吸引更多的学生观众。

该校的博物馆对于设计前沿活动很感兴趣，努力让观众参与简单的动手活动，以随意的方式与专家对话，或是让他们投入互动表演当中。最令人兴奋的是，博物馆可以借此突出自己的收藏和学科优势。比方说，该校以太空研究出名，无论是太空探索、太空技术或是太空前沿课题都位列顶尖之流。为此，博物馆目前正在开展一系列校园展览和活动，以宣传大学在空间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

另一个可能的主题是莎士比亚的文化遗产。2016 年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宣布将从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购得《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的副本，即莎士比亚全集，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这一举措引发了莎士比亚主题活动的灵感。目前，美术馆正在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出现的植物、动物、装饰物、地理位置和天文相位寻找参考资料，其合作部门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大学天文馆、图书馆特藏部门，以及英语文学、历史、戏剧舞蹈等科系。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该校的博物馆希望能够提升学生的认知度，并且尽可能利用大学的宣传部门在校内外举办各种展览和文化活动。

科罗拉多大学的博物馆同时密切关注着那些针对刚刚进入校园被称作“Z 一代”的社会学研究和市场调查。这些出生于 1997 年以后的人群被称为“Z 一代”，可谓真正的“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自幼年开始，这一代人就已融入到信息时代的洪流中，从谷歌和 YouTube 视频网站上获取各类资讯。早期研究表明，这一代人雄心勃勃，独立自主的精神很强，渴望着以不同于前代的方式让世界刮目相看（Jensen 2015）。他们迫切希望改善他人的生活，早早便参与慈善活动，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筹募资金、奔走相告（Levitt 2015）；他们也通过志愿活动为各种组织机构提供支持。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虽然生长在数字化时代，却仍偏好与朋友们面对面的交流。这一趋势为博物馆带来了机遇，要求

博物馆不仅仅是吸引千禧一代，还要吸引 Z 一代。通过创建随意的社交空间等，博物馆可以有效地吸引千禧一代参与各种创意活动、构建意义的活动以及非正式的学习活动。与此同时，博物馆可将增强自身对 Z 一代的吸引力，从而更好地培养未来的文化支持者。

致谢

感谢帕特・柯桥维克（Pat Kociolek）对本文提供的珍贵意见和支持。感谢布瑞特・舒尔尼克（Britt Scholnick）的倾听以及对写作内容的批判性意见。

参考文献

Bresman, H. 2015. “What Millennials want from work, charted across the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5/02/what-millennials-want-from-work-charted-across-the-world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3, 2015; accessed on ??).

Brunecky, J. 2010.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Young Adult Programming: How Six Denver-metro Area Institutions Are Adjusting to Changing Patterns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mong Young Adult Audience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Hinz, H., D. Frlan, W. De Vos, L. Nikocevic, T. Hadjinicolaou, A. Garlandini, L.Raposo & S. Bernis 2013. “Lisbon Declaration to Support Culture and Museums to Face the Global Crisis and Build the Future”. Signed April 6, 2013. http://icom.museum/fileadmin/user_upload/pdf/Statements/ENG/Lisbon_Declaration_ENG.pdf (accessed on ??).

Jensen, B. 2015. “Are you ready for generation Z?”.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27, 8: 9-9.

Kociolek, J.P. 2015. “The BioLounge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Engagement and access: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museums*, ed. J. Decker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91-98.

Levitt, A. 2015. “Make Way for Generation Z.”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5/03/29/jobs/make-way-for-generation-z.html?mwrsm=Email&_r=0 (last modified March, 29, 2015; accessed on ??).

Mason, D.D.M. & C. McCarthy 2006. “‘The feeling of exclusion’: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art gallerie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1, 1: 20-31. DOI: 10.1080?09647770600402101

Peterson, R.A. & G. Rossman 2008. “Changing arts audiences: Capitalizing on omnivorousness”. In *Engaging art: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cultural life*, ed. S.J. Tepper & B. Ivey (New York: Routledge), 307-342.

Pew Research Institute 2014. “Millennials in adulthood: Detached from institutions, connected with friends.”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3/07/millennials-in-adulthood/ (last modified March 7, 2014; accessed on ??).

Shapiro, T., P. Linett, B. Farrell & W. Anderson 2012. *Campus Art Museums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nversation. Cultural Policy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联系方式

Jessica Brunecky, 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Membership,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rt Museum

Address: Visual Arts Complex, 318 UCB, Boulder, Colorado, 80309, USA

E-mail: jessica.brunecky@colorado.edu

http://colorado.edu/cuartmuseum

关键词

Millennials, Generation Z, Audience Engagement

UMAC–TFT²：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教学工具的“特派组”

Dominick Verschelde，Dominique Adriaens / 文

摘要

绝大多数的大学，其收藏品在开始时都是课堂里的教学工具，包括一系列的展示用具、人像模型、海报、幻灯机图版等等；如今这些工具都具有值得保存的历史价值。这里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些藏品用于当前的工作坊、实践课程和在线学习中？我们提议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UMAC）成立教学工具的特派组（taskforce for teaching tools）（UMAC–TFT²）来设计相应的策略，为教学工具藏品的国际交流制定指南和规范。我们也可建设国际开放平台，让大学博物馆提交自己的藏品，让感兴趣的人都能获得分享。这一资源对教育史的研究也有极大价值。

引言

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研究实验室才正式进入高等学府，博物馆里大部分较为古老的收藏都始于课堂教学用具，例如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根特大学动物学与比较解剖学的收藏（Zoology Collec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Collection of the Ghent University）等。这些博物馆里的藏品均被视为教学用具，诸如弗里德里希·齐格勒（Friedrich Ziegler，1797—1880）、路易斯·托马斯·杰罗·奥祖科斯（Louis Thomas Jérôme Auzoux，1797—1880）、保罗·奥斯特罗（Paul Osterloh，1850—1929）、博谢恩（Beauchêne）等人像模型，同时还包括海报、教学挂图、幻灯机图版等。现代教学中，这些物品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是很重要的价值。本文作者意在讨论这些物品和用具在现代教学中重新发挥效用的可行方式。

图 1 医用水蛭模型

教学用具

教学用具是什么？其用途为何？如前所述，比利时根特大学博物馆（Ghent University Museum，GUM）的每一件动物学藏品都是为了教育目的而收集、解剖和展示的。现如今，学生们还会在博物馆里上课，利用藏品来学习动物学、形态学和解剖学知识，以求看到“标本”。多年来，许多形态学和解剖学教具纯粹是为课堂讲解而制作的，其目的是为了展示平面图像难以呈现的细节结构，如亚里士多德的灯（Aristotle’s lantern）、海胆牙具（tooth apparatus of an urchin）等。除了物品和解剖学教具外，博物馆的收藏还保存了一系列真实教学用具，如齐格勒（Hopwood 2002）、奥祖科斯（Maerker 2008）、奥斯特罗、博谢恩（Spinner & Al. 2011）的人像模型，以及海报、教学挂图、幻灯机图版等。很多这样的用具，其本身即成为了藏品，甚至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不过，也有一些需要经过调整才能为教学所用。根特大学的很多收藏都属于这种情况。最近，根特大学博物馆的一个模型（图 2）被佛兰德当地政府（Flemish Government）指定为官方展品，这意味着藏品将获得政府的保护和修复的资金。教学挂图或是购自知名制作者，或是在大学校内制作以尽可能满足教授们的需要，而模型能够立体地、等比例地（从大机器的小模型到形态结构的放大模型）呈现真实结构或理论概念。由于每件物品的重要性和可用性并不显见，所以越来越有必要了解每一件藏品。

由此，我们必须对以下内容进行编目：历史教具、最近课堂和讲座报告会使用的物品、课堂和讲座报告的讲义文本等等。并且，物品不仅会在课堂或讲座中使用，还会出现在研究项目里。在动物学收藏中，每年本科生论文都会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是科学传播（为临时展览调研并撰写文本）；二是对哺乳类动物头骨或颅下骨做形态学分析。这要求学生们能够识别出一整具骨骼中的相关部分，并对不同物种的头骨或颅下骨做形态学的分析。此外，许多大学的自然历史类收藏保存了有价证券和印刷类藏品，这必然需要向公众和全世界的研究者开放。科学类期刊已经开始要求在接受投稿之前，研究者必须向科学群体公开其研究资料（cf. http:// datadryad.org/）。

恰逢其时，这正在成为许多大学博物馆及其收藏作业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我们目前拥有什么、有哪些“旧”用具还存在着，哪些用具含有历史价值，而且更需要知道我们可以赋予这些用具什么样的新用途，而不必让大家重复无意义的工作。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解决，其中的机遇也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大学博物馆中这些巨大的潜能都可以透过现代多媒体和数字技术获得全新视角。正因为这一事业非常宏大，我们需要组建特派组来制定标准，促进其发展。

图 2
18 世纪考古学收藏，安东尼奥·吉吉（Antonio Chichi）的万神庙软木模型（Cork Model of the Pantheon）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教学工具的“特派组”

教学用具的前景如何？如前所述，大学博物馆保存了科学与教学用具、物品与文本的大量信息。公开这些信息并予以编目，是一项非常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专注于此的人员才能胜任。为此，应当成立一个教学用具特派组来制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的指南和策略，协助未来的工作。特派组成员要注意以下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工作宗旨、格式、指南、利害关系人、数据库和程序等等。特派组成立后就可以设计开放资源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大学博物馆可通过向藏品委员会提交教学用具和科学资料，对全世界开放使用。为了方便起见，建议从自然历史收藏开始编目。不过，特派组成员也应当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包括教育史等。这样的话，当人们讨论上述问题时，话题的涵盖面就会更广，讨论也更加客观公正。特派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简化所有教学用具的信息，使用具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其最终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够自由交换各自使用教学用具的理念，而较为理想的是能查阅到相关的实际收藏品，并且能够直接咨询那些最先提出相关理念的个人。任何大学收藏品都可以通过现有工作坊的方式向潜在的未来科学家们开放，从而使他们获益。特派组应该梳理所有工作坊的理念和物品的格式，其中包括某个工作坊中哪些物品可被使用的建议，尽量做到统一和规范。有赖于新媒体的出现，目前的会议和讨论均可在线上进行。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一旦确定特派组的形式和使命，即可开始招募组员。

正是由于这样的资源可为教育史研究带来愈发重要的意义，所以教学用具可被视为具有教育和研究的双重功能，有必要吸引教育史领域的工作者。

根特大学博物馆动物学收藏中的工作坊和教学用具

作为特派组的最初成员，其主要关注的是自然历史的收藏。首先，第一步就是将根特大学博物馆所有动物学藏品的文本、工作坊的哺乳类动物标本和工作表都翻译成英文，并向那些有需求的同事们开放。本文作者简要概括了其中最受欢迎的工作坊课程。其实，任何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的成员都可索取该工作坊的完整文本。

题为“生态追击和池塘生物”（Ecology Pursuit and Pond Life）的桌面游戏（board games），适宜年龄为 7~14 岁。这个教育类的游戏包括两部分：约 400 个有关动物学、生态学、迁徙、环境和保护的选择题，供参加者在游戏图版上作答。每个人手中的棋子不同，每枚棋子均包含了足够的信息量。随着每枚棋子的行进，每位参加者的游戏都不一样。

“感官参与”（Concerning Senses）工作坊，适宜年龄为 7~12 岁。该工作坊重在训练孩子们在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中的观察能力。演示的视觉设置了限制，这样就可让孩子们辨认不同动物的声音，让他们用骨头和皮毛来做触摸实验。为了说明观察的最好方式是结合多种感官，该工作坊让孩子们蒙住眼鼻品尝食物，让他们知道品尝并不只是味蕾的事情，其中也包含了视觉、嗅觉（这是最为重要的，否则为何说食物“闻着真香”，或是在感冒鼻

塞时无法享受美食？）和舌头的触觉，最后才是味蕾。每天我们都在使用不同的感官“感觉”食物，而不仅仅是“品尝”（味蕾和鼻子的化学反应）食物。科学也是一样，需要客观观察，需要尽可能多的、不同方面的测量和感觉，同样需要大量的控制和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不仅对科学至为重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所助益。

“进化过程”（Evolution@work）工作坊，适宜年龄为 14~19 岁。该工作坊中，学生们可以重温有关达尔文进化论最常被询问的 3 个问题：（1）物种能演化发展成为新物种（趋异进化）吗？（2）不同物种能够适应同个生态位类型并演化成近似物种（趋同进化并产生新物种）吗？（3）我们能见证进化过程吗？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学生们需要识别并指出包括马、猪、山羊、绵羊的不同动物的 4 块头骨，以及不同狗的头骨（短头型）、猫的头骨（包括短头型）、浣熊和不同海豹的头骨，同时也包括蹄兔、大象、海牛、河马和不同海豚与鲸鱼的头骨。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们认识“异体同形”这一进化论中的主要概念。工作坊要求学生们指出不同骨头的位置，包括鼻骨、额骨、颅骨与颌骨等，并从中发现鼻骨和额骨不断缩短的趋势（使得鼻子向后向上张开），以及颅骨与颌骨是如何延长以保留吻部和牙齿的。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学生们需要找到栖息地相似的不同脊椎动物，从形状上总结出这些动物的生态位或“居住地”，其中涉及的动物及其栖息地，包括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相似的栖息地（鲨鱼、鱼龙、海豚，生态位：开阔水面）、欧亚食虫动物（食虫目）和啮齿动物（鼹鼠和鼹形鼠，生态位：地洞），以及两种不同的有袋动物和食肉动物（袋狼与狼，旷野捕食者；袋獾与貂或黄鼠狼，灌木丛捕食者）。为了回答第三个问题，学生们需要考虑拥有标准腿部、过短腿部和无腿之间的可能进化过渡，这种过渡可见于两栖动物类（参见蝾螈科、无肺螈科和真蚓科三类代表物种科），爬行动物类至少属于两种不同物种（石龙子科内和蛇蜥科内）。

“塘中生物”（Life in the Pond）：这一活动的适宜年龄为 10~18 岁。学生们在植物园内提取池塘水样本，在关键提示的帮助下透过显微镜试着辨认、学习并找到生物体。这个活动只要对线索稍作修改，就能适用于任何年龄层——小孩子用图片线索提示，大孩子或者甚至大学生则用更详细、更困难的线索。

“寄生虫”（Parasites）：这一课程的适宜年龄为 14~19 岁。寄生虫不只是“坏家伙”，也是有趣而聪明的生物。关于寄生现象和寄生虫的这一课中，学生们可以参观整个藏品系列并对标本进行讨论。

“脊椎动物的特征和进化”（Characters and Evolution of Vertebrates）：这一课程的适用年龄为 16~20 岁。学生们主要关注的是不同脊椎动物进化、改变了的特征，而所有特征和转变都通过骨骼藏品加以展示。

通过对工作坊或课堂进行不同方式的跨学科整合，这一做法可以让学习变得丰富有趣。在一个有关“能量流”（energy flow）的工作坊中，根特大学博物馆的 3 件藏品为活动提供了素材。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事物之间的联系，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主题，将这些主题与众多的不同收藏相结合。就拿麦地那龙线虫（Guinea worm （Dracunculus medinensis））来说，动物学告诉你，那是一种寄生在人类腿部皮下的线虫，以及它的生命周期；医学则会告诉你，必须讨论萃取法，以及它与医学界的标志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之间的联系；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会告诉你，这种寄生虫甚至出现在基督教《圣经》（*Bible*）（《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等等。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和学科，对某件藏品或物品进行深入探讨。不同收藏可以运用在许多主题中，而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的教学用具特派组能极大地促进这些藏品的跨学科研究。

致谢

作者们非常感谢奈卡能博士（Dr P. Nykänen）在 2015 年马尼拉年会上，代替因健康问题未能出席的第一作者弗尔谢德（M.Sc. D. Verschelde）作报告发言。

参考文献

Bible, *Old Testament* 21, 6.

Dryad Website. http://datadryad.org/.

Hopwood, N. 2002. *Embryos in wax. Models from the Ziegler studio*.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erker, A. 2008. Dr. Auzoux's papier-mâché models. In *Explore Whipple Collections*, ed. Whippl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ww.hps.cam.ac.uk/whipple/explore/ models/drauzouxsmodels (accessed May 5, 2015).

Spinner, R., J.-F. Vincent & A. Wolansky 2011. Discovering the Elusive Beauchêne: The originator of the disarticulated anatomic technique. *Clinical Anatomy* 24:797-80.

联系方式

Dominick Verschelde, M.Sc., Zoologist, Curator – Conservator of the Zoology Collection.

Address: Ghent University Museum – Zoology Collection, K.L. Ledeganckstraat 35, Ghent, 9000, Belgium.

E-mail: Dominick.verschelde@ugent.be

Dominique Adriaens, Prof. Dr., Director of the Zoology Collection and head lecturer of the research group Evolutionary Morphology of Vertebrates.

Address: Ghent University, Biology department and GUM – Zoology Collection, K.L. Ledeganckstraat 35, Ghent, 9000, Belgium.

E-mail: Dominique.adriaens@ugent.be

关键词

Teaching Tools,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大学博物馆：教学之外的意义

Chang Yueh Siang / 文

摘要

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品类型多种多样，其议事日程和目标均与其他公共或国有博物馆不相一致。大学博物馆属于非专业博物馆，其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的教学服务，而管理则由相关学科的系或所的教学或行政部门来负责。由于藏品范围广、目的不一、利用方式不同以及可用资源不同，大学博物馆在提升其博物馆的专业性能过程中或许会遭遇各种挑战。然而，随着大学博物馆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功，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建立大学博物馆的成熟机制了，尤其是在新兴的大学博物馆之间实施最佳的行业规范。

引言

2014 年，笔者有幸参加了亚洲大学博物馆大会（Gathering of Asian University Museums），目睹了不同的大学博物馆完成的许多振奋人心的工作，很受启发。然而，会上一些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尤其是专业博物馆的运作原理在大学博物馆的适用性等问题。

本文最初发表于 2015 年在马尼拉召开的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UMAC）大会上，主要探索大学博物馆及其收藏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博物馆。

“双馆记”——两个博物馆的案例

先拿公共博物馆来说，如：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V&A）。该馆是笔者接受博物馆业务训练之地。作为英国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MA）的一员，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遵循的是协会的指南（出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职业道德准则）。英国博物馆协会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职业道德准则为处理、收集和展示藏品，以及如何利用博物馆和多样性等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博物馆的最佳行为规范，对于保护、宣传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笔者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博物馆关于如何利用馆藏方面的问题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极为相似，两者在博物馆实务上的差异并不明显。

但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经历引发了笔者对一份国际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在这个特殊的博物馆群体（即大学博物馆）中的重要性和适用性的思考。

第一个案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一个名为“苏非派与胡须男”（Sufi and the Bearded Man）的展览。简要而言，该展的内容是一项社会学研究，研究对象为位于新加坡的一个女性穆斯林神秘主义者神殿。神殿不乏信徒的参拜，但又必须为地方开发让路。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策展人取得了神殿看管者的同意，在神殿被拆除后不久即收集了各种展品，其中包括一个用作香器的花盆和一段树干。博物馆收集的口述历史记录显示，信徒们一开始不愿让出神殿所在的这块土地，阻挠这棵树的砍伐，土地的收回因而停滞。最后，神殿看管人明确表达愿意移除树木，于是树木被砍伐了。参观展览的观众首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考虑到神殿所在的社区将此树视为圣树，与神殿相关的物品在被博物馆收集之前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其神圣性？（2）我们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如果开放这些物品（且将其置于原来的环境之外）给人们观看，会不会冒犯观众或是神殿的信徒？[1]（3）这些物品并不会成为博物馆的馆藏，也不会作为文物登记入册，那么在展览结束后要如何进行适当的处置（因为我们向神殿看管人借出物品时未处理好物品的后续保管问题，且自那以后与看管人失去联系）？[2]

2014 年 10 月，京都大学主办的一场名为“挑战亚洲大学博物馆”（Challenging Asian University Museum）的研讨会引发了人们对更多问题的思考。其中一个案例是有关 Ohminahs 的虚构故事，这里提出了相似而不尽相同的问题：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就其收集的人类学资料（出于普及学科知识的目的）进行了展示，而这些资料来源于传教士。

---

1 MA 职业道德规范 7.6 条主张，博物馆应当“考虑对特定藏品的有限利用，尤其是具有仪式或宗教重要性的藏品，对这些藏品的无限制利用可能引发对事实或文化继承者的冒犯或不敬。”此外，3.6 条认为博物馆要确保“回应不同文化群体的多种要求”。www.museumsassociation.org/download?id=944515（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2 MA 职业道德规范 6.8 条，“理事机构负责确认收藏品的正式所有权和监护权，理事机构必须确保处理决定是根据最高的专门知识标准作出的，并考虑到所有法律和其他伴随的情况”；以及 6.12 条，“征求利益相关者（如捐赠者、研究人员、当地社区和资源社区以及博物馆服务的其他人员）的意见，这些利益相关者对拟议的处置方案有既得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征得捐赠者的同意可能是一项法律要求。在适当情况下征询同事和界别团体的意见。”（出处同前）

该博物馆在为观众提供更多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他们定下的使命是“引发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尤其是，他们为视障观众设计了带有辅助设施的展览，得到了当地视障人士的一致好评。就展出的内容而言，收藏品的出处、收藏品转移的合理性、转移物品的性质和展陈方式等方面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一点必须强调。然而，针对该校博物馆的人类学物件的创造性展示，人们会对这些物件的文化敏感性作出一种本能的反应。[3]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展品的转移和出口、亵渎圣物的风险、来源人群的敏感性等问题。这让南山大学博物馆（Nanshan University Museum）开始斟酌是否应该参考英国博物馆协会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做法，为展览设计一份详细的、标准化的最佳实践准则。毕竟，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针对“重要性、责任性、持续性、废弃和终止”等方面制定了一个指南：“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委员会拥有一个专业的、符合伦理的标准 [4]，为博物馆的运营提供必要的指导。此外，该指南已经相当详细地写明了获得藏品、开发新收藏或终止现有收藏的流程，也可以指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协和地方及国家博物馆协会就专业博物馆标准发布信息的程序。”[5]

问题的解决并非那么简单明了。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即便是公共博物馆或国家博物馆，它们并非是一直能够谨慎处理伦理问题的。一些著名的国际博物馆也不例外，这些博物馆将人类学物件作为艺术品进行展示，从而忽略了文化方面的敏感问题，例如亚历山德拉・马丁（Alexandra Martin）对盖・布朗利博物馆（Quai Branly Museum）展示的讨论（Martin 2011）。另一方面，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 River Museum in Oxford）这所大学博物馆在诸多问题上做出了表率 [6]，比如：如何送返与收藏人类的遗物，如何重新组织展品以避免冒犯宗教群体有关死亡和随葬品的准则 [7]，如何在设计博物馆展览叙述时与多元文化进行协调，等等。[8]

不同的背景

许多大学博物馆，尤其是成立于 20 世纪的大学博物馆，都是在没有教学收藏品的情况下创建的。要让这些年轻的大学博物馆遵循公共博物馆采用的博物馆通用指南（如国际博协的指南），实在是挑战重重。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于两类博物馆的不同背景。

在探讨公共博物馆伦理指南的来源和出处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些指南反映了特定历史环境下建立的历史收藏，比如殖民扩张、战争、领土扩张、非法迁移和贸易等。

对于去殖民化后建立的博物馆或是拥有大量地方收藏品的历史博物馆（如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博物馆）而言，这种背景或许是缺失的。因此，就西方语境下设立的实践准则而言，年轻博物馆面临的伦理问题可能会涉及指南的方方面面。

---

3 MA 职业道德规范 3.3 条：“发展和推广博物馆，以吸引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观众；目标是为每一个潜在的用户提供感兴趣的东西。”（出处同前）

4 MA 职业道德规范 3.15 条：“考虑限制某些特定藏品的使用，如果不限制使用可能会对实际或文化后代造成冒犯或伤害。”（出处同前）

5 UMAC 指南关于“重要、责任、保养、清理与关闭”，http://publicus.culture.hu-berlin.de/ umac/pdf/statement.pdf（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6 “关于送回博物馆收藏的人体遗骸的要求，将根据大学关于由其整个博物馆保管的人体遗骸的政策加以审议（参见 www.ox.ac.uk/gazette/2006-7/supps/2_4787.pdf）。1990 年，一项这样的要求导致了从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向澳大利亚土著社区归还骨骼遗骸。”（《人类遗骸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http://www.prm.ox.ac.uk/human.html（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7《对真理和知识的狭隘看法》。http://www.spiked-online.com/newsite/article/3017#.Vfgjh3uw-Rs。（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8《在与海达人的合作中》。http://www.prm.ox.ac.uk/haidaproject.html（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公共博物馆也要面对更广泛的人群、更大数量的观众。在当今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博物馆的展陈和阐释不可避免地将面临不同声音的质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博协和英国博协的指南确实为历史收藏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为将来的最佳实践提供了参考。这些指南产生于特定的背景。比如，大英博物馆就是根据英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选择地采用英国博协指南的[9]，而美国博物馆协会则针对美国的环境而设计准则的。总体来说，主旨原则是相似的。正如 2015 年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大会开幕词所述，大学博物馆可能被描述为“生命的实验室”（Life’s Laboratories）。[10] 公共博物馆被视为国家遗产的保管者、历史的教授者，而大学博物馆则体现了学界的研究和实验，在反映当代社会、拓宽研究领域、开拓未来等方向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简言之，大学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与公共博物馆不同，目前的博物馆伦理指南并不适用大学博物馆，尤其是欧美之外的大学博物馆。在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大会上，专家们就“大学博物馆”（Universeum）提出了一个甚为有趣的问题[11]，即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大学博物馆项目？这个问题在欧美地区几乎不可能作为问题而提出，因为欧美博物馆在其演化历史中具备相当的独立性，其自身的管理和发展多与私人收藏有关，虽然现在或许也得到政府补助。在亚洲，许多大学和博物馆都是新成立主权国家的产物，政府不仅提供财政拨款，也对这些机构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其收藏来源在伦理层面及其影响力方面也大不相同。

举例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起源于马来亚大学美术馆（University of Malaya Art Gallery），其中涉及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马来亚大学由英国殖民政府成立，美术馆和藏品关联的艺术史研究旨在为世人展示新马来亚的面貌，即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的交汇点。新独立的印度政府于 1959 年赠送了一批印度艺术品，包括神庙雕塑、绘画、纺织品等等。1960 年，第二任馆长威廉·威利茨（William Willetts）走访南亚和东南亚市场，收集了东南亚的纺织品，或者从亚洲艺术家那里直接购买收藏品，这主要是考虑到相关材料的运送、出口和文化借用等因素的制约，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有风险的文化物品，在市场上是可以通过公平买卖获得。与 18、19 世纪欧美国家收藏品相比，不公平的关系还不太明显。最终，对许多大学图书馆来说，大学博物馆的藏品起源、目标以及动力都和公共博物馆形成的历史不一样。

关键在于收藏品的来源以及收集文物的目的。从历史问题出发，我们不能将公共博物馆的指南以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应用于大学博物馆，这一做法是不妥的。大学博物馆成立的背景多种多样，其藏品来自于合法购买或转移，这不能套用公共博物馆指南。因此，南山大学博物馆本身的设立可能就带有文化传教的任务。如果藏品是通过合法途径收集的，属于正当的礼物赠予或合法转移，这就不太涉及文物非法转移的问题。又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印度神庙雕塑，该雕塑来自 1959 年印度政府的赠予。因此，严格来说，这不属于非法转移或非法出口文物，与其他被盗文物的情况不同。

---

9 例如像英国博物馆协会的文档显示的那样，社区爱情博物馆：“除了他们的传统角色的收集、保存和共享丰富的收藏，博物馆现在发现他们在支持社区的发展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博物馆正在利用他们独特的收藏和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努力成为地方社会各界的声音，可以反映在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上。”出自《社区…爱情博物馆》，博物馆协会（英国）。www.museumsassociation.org/download?id=143114（访问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10 De Leon, F：2015 年《在“大学博物馆及馆藏研讨会”开幕典礼上的欢迎辞》，圣托马斯大学，2015 年 5 月 11 日。

11 Soubiran, S：2015 年在“大学博物馆网络：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经验建议”专题讨论会上介绍“大学博物馆”（复合词“Universeum”），菲律宾马尼拉 UMAC 会议，2015 年 5 月 11 日。

伦理博物馆“最佳实践”的相关性

以上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大学博物馆无需考虑博物馆伦理问题，也不意味着大学博物馆可以随心所欲，随意拣选自己想要遵守的规则。大学博物馆可以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发现目前的展陈和诠释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再来探索出自己的一套实践原则。在应用博物馆通用指南时，必须考虑到大学博物馆对文化背景的认知和敏感度，必须考虑到全球大学博物馆特定背景中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问题。

最后，大学博物馆必须设计自己的指南，增强伦理敏感性，从而探索出大学博物馆的最佳实践方案。清晰连贯的伦理指南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诚如国际博协在《博物馆伦理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的前言中所述：“达到博物馆的最低标准，形成一系列为博物馆专业实务服务的原则”。[12] 这种“最低标准”为大学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最佳实践的重要指导。虽然这些人员可能早已接受过学术或业务上的训练，但在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管理或博物馆学等领域或许未受过专业训练。指南为教学展览中的藏品提供了另一层面意义上的保护，鼓励大学博物馆以一种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来维护、推广自身的藏品。

伦理指南的存在主要在于提醒博物馆在保护、推广和建立文化遗产时应当心怀敬意。专业博物馆与美术馆联盟（Association of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AAMG）在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当中，将以打造专业精神和最佳实践作为使命的核心部分，此举着实可圈可点。大学博物馆的收藏面临的境况或许与公共博物馆不同。即便我们未必违反伦理指南或直接受到规则的影响，我们也必须留意公共博物馆的经验和实务，从问题中学习，用一种负责的、具有人文敏感性的态度来设计自己的展陈。虽然我们的收藏品来源具备了道德合理性与合法性，我们也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对观众提出的任何异议作出合理的回应与行动。万一有观众走进大学博物馆或美术馆时对收藏品的所有权和展陈方式提出异议时，大学博物馆可以参考现有的指南和伦理原则来回应。

即使在一个经济紧缩、效率至上的时代，大学博物馆也应考虑将博物馆学科和伦理指南作为重要的实践原则，尤其是在保护、保存和收藏品管理等方面，以便向大学管理层证明博物馆的藏品不仅仅是一项开支，而且是投放到维护和展陈上的一项长期的投资，一项越专业越有意义的投资。大学博物馆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到的话语权越多，管理层制定决策所凭借的信息就越多，就越能合理地为博物馆提供最低预算。换言之，大学博物馆的运营应当以博物馆学原则为首，不能为财政现状所困。

结论

为什么伦理原则的应用问题如此重要？一个博物馆看待伦理和实践的态度表明了博物馆处理、管理、保护和展示藏品的方式。这种方式影响着观众的观感：如果我们只为满足好奇而展示藏品，观众也便带着好奇而来；反之，如果我们带着文化敏感性而展示藏品，观众也便因此受到文化上的触动。

京都大学论坛（Kyoto University Symposium）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学博物馆的角色是什么？来自不同大学博物馆的与会者们难以给出一份高度凝练的答案。不同的大学博物馆拥有不同类型的收藏，行使着各不相同的功能。我们要如何应用规则呢？一件单码的 T 恤衫无法满足所有人的体形，但我们可能要仔细考量，“定制”出一套适用于每个博物馆的指南，可以将现有的《指南和伦理实践原则》（*Guidelines and Codes of Ethical Practice*）作为模板。我们可以借鉴其他文化机构的经验，学习现有案例当中可学习的地方，应用其中的一些通用原则。不过，由于具体背景缺失而导致指南无法适用的话，我们或许不必因此而感到愧疚难当。

12 国际博协（ICOM）：2013 年《博物馆道德守则》（四）。

参考文献

ICOM 2013.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 Paris: ICOM.

MartIn, A. 2011. Quai Branly Museum and the Aesthetic of Otherness. *St Andrews Journal of Art History and Museum Studies* 15, 53-63.

联系方式

Ms Chang Yueh Siang, Curator, NUS Museum
Address: 50 Kent Ridge Crescent, Singapore 119279
E-mail: cfacys@nus.edu.sg
http://museum.nus.edu.sg

关键词

Museum practice, Ethics, Access and diversity

大学博物馆对争议性话题的探索

Phaedra Livingstone, Jill Hartz, Barbara Rothermel / 文

摘要

理论上来说，大学博物馆身处的高校背景保证了其自身的学术自由，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责任，即通过研究与策展来创造新知识的责任。由此，大学博物馆在探讨那些可能富有争议的问题时，比其他博物馆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大学博物馆的独特性还在于指导博物馆从业人员获取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并将这些技能与知识用与策划与探索公共项目中的“热门”话题。本文首先探讨的是大学博物馆作为争议性话题的论坛平台的角色，随后提供了两个案例以展现大学博物馆是如何探索争议性话题的。

大学博物馆：有利的讨论平台

众所周知，博物馆策划展览的目的在于增进理解、激发公众的好奇心与兴趣，并为观众提供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博物馆的目标不是要成为社会变迁的仲裁者或者去引导观众如何思考，而是要促进观众的公民参与度，提高他们的公共话语权。大学博物馆在完成其教学使命的同时，也应该为人们的学习、反思、公共话语以及职业发展提供理想的场所。作为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大学博物馆可在校园内为学生们讨论难题时提供安全的环境。大学博物馆可以通过策划一些刺激性的展览和相关项目来引发观众的批判性思考，帮助他们如何质疑以往的认知，如何将当代社会问题作为理解某个话题的透镜，或是如何以世界公民的身份看待周遭世界。

大学博物馆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充当着多种角色，而作为潜在争议问题的论坛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阐释性的展览能够协助人们展开辩论与讨论，这一功能是其他场所难以实现的。况且，至少在原则上，由于拥有高校背景给予的学术自由度，北美的大学博物馆在展开此类讨论方面比其他博物馆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所以我们建议大学博物馆应当将这些潜在争议问题纳入到展览项目的策划当中。由此一来，大学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以及新知识的摇篮，应当与高校和更大的社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本文提供了两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学博物馆是如何通过这种途径对争议问题进行讨论的。

首先，我们查阅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Livingstone 2016）以来加拿大文化管理局对展览发展的相关研究，对争议性问题和公共博物馆展览作出了一般性说明。近几十年来，一系列有关知识与政治的权威性、交际效用、经费和公共博物馆管理事务之类的挑战性话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大型展览的详细研究。当这些挑战性话题引发公共矛盾时，媒体则不可避免地会将其定义为争议。现在，这已然成为一种持续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从不少北美艺术媒介的头条标题上就能够看出来。不过，与此相对应的是，博物馆界仍然对争议性问题知之甚少。博物馆专业术语中，通常将“争议”或是定义为有待规避的事物（即一种公众羞于启齿的事物），或是定义为能够用来吸引公众注意力并且能为博物馆带来利益的话题。

大型展览一般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策划。在此期间，社会大众会对此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这样一来，博物馆就可以检验一下自身作为公共空间的实际意义，看看自己究竟是意义非凡还是无关紧要。另外，公众的观点也可作为博物馆民主化目标改革的催化剂。虽然最佳实践原则以及职业道德可以指导博物馆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法规、政策和经费项目不仅会对博物馆的生存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在实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共博物馆已经慢慢开始自负盈亏，势必会受到经费筹措和市场营销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区咨询、讲解策划、观众调查和项目合作等活动有助于避免产生一些争议性问题。焦点小组和观众调查是设计高效展览活动的最佳实践方法，但这些方法不能被视为规避风险的万能药。在现实中，给博物馆带来革新的是博物馆从业人员，而不是观众。

文化管理者对博物馆和观众能力缺乏信心，而他们要讨论敏感问题时，争议恐怕也随之而来。展览是一种大型而复杂的项目，对专业能力、时间和金钱的要求极高。临时展览可以通过巡展的方式获取更大的利润，但这也需要其他博物馆接受巡展的进驻。博物馆专业人员对争议的恐惧以及对财政亏损的恐惧，这些都能影响展览策划中的自我审查。不过，观众调查显示，公众期望博物馆用一种平衡的态度处理争议性问题，而他们并不惧怕辩论敏感话题（Ellison 2010；Livingstone 2003；Mintz 1995）。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北美博物馆的工作变得更为专业，一开始就将博物馆工作人员培训列入文化遗产技术专家的培训项目。现在，我们必须注重培养公共专家，做好在愈发复杂的管理要求下处理多种公共问题的准备。大学博物馆在这样一个复杂、敏感、“充满风险”（risky）领域内，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培训场所。培训新进博物馆工作人员，使其获得处理争议的能力，是今天大学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功能。这方面的培训，我们会在下文案例 B 中进行讨论。我们先看一下案例 A，因为这个案例展示的是争议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要在大学博物馆当中讨论争议问题不只是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整个机构参与的过程。

案例 A：“解放过去——卡拉•沃克有关奴隶和权力的故事”

2014 年 1 月 25 日—4 月 6 日，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UO）约旦・施尼策尔艺术博物馆（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JSMA，以下简称施尼策尔博物馆）举办了“解放过去：卡拉・沃克有关奴隶和权力的故事”（Emancipating the Past: Kara Walker's Tales of Slavery and Power）展览。展品来自施尼策尔印刷品收藏，策展人为杰茜・蒂缇里奥（Jessi DiTillio）。杰茜在俄勒冈大学完成了有关卡拉・沃克的论文并获得艺术史学位，其后在博物馆从事策展工作已经两年。卡拉・沃克是一名美籍非裔现代艺术家，以制作有关奴隶和美国内战前南方地区的激进作品而闻名于世。其作品包括绘画、雕塑、蜡模和视频，这些都展现了高度性别化和种族主义下的黑奴与白人奴隶主形象。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残忍的、令人不安的、滑稽的和陈词滥调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则时时让观众想起了自身所带有的偏见，想起了美国种族关系的悲惨历史。

施尼策尔博物馆在策划主要展览时会考虑到许多实际因素（如：职员的时间、资源、空间分配、预算等），同时也会估量展览项目在学术支持、交叉学科合作、社区利益和博物馆战略目标深化等方面的潜质。“解放过去”展览成为博物馆处理上述问题的一门自学功课。对于该展当中性别化和暴力的图像可能带来的消极反应，施尼策尔博物馆做了预设和安排，就该展览对于不同观众而言的适当性和相关性进行了公开讨论。然而，观众们并没有准备好去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和地域环境与种族历史之间的深刻的牵连关系。沃克对此在其作品中作出了阐释。在早期的研究阶段，就有资料显示了俄勒冈州在很早以前已弥漫着种族偏见的氛围。这一发现使得沃克的艺术作品要重新定义其创作背景，增加新的合作伙伴，并修订讲解说明和展览目的。

策展开始时，博物馆也着手进行了研究，并为校园内外的观众找寻构建展品脉络的方式。首先，博物馆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action team），召集到了可能对展览感兴趣的相关人士。他们一同观览图像，讨论展览目标和学术相关性，策划安排观众群体、市场营销和筹资策略等问题，并与博物馆员工一道进行展览规划。为了这次展览，不少来自艺术史与工作室艺术、英语、民族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电影学、剧院研究、美国历史和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均加入到了策展队伍的行列。另外，俄勒冈大学平等参与及学生生活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非裔美国学生会的成员也获邀为展览提供支持，进行对外宣传。校外合作伙伴包括地方中学、社区大学、教堂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分会等机构。与这些单位的合作为博物馆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博物馆的利用率也大大增加。围绕展览设计的各种活动包括策展人座谈、影片放映、现场表演，以及俄勒冈大学访问学者和教授们提供的讲座等。

博物馆的展览将遇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们开设了一种名为“为什么俄勒冈没有更多黑人？不为人知的历史”（Why aren't there more Black People in Oregon? A hidden history）的公开讨论。讨论的内容震惊了策展小组。施尼策尔博物馆执行馆长吉尔・哈茨（Jill Hartz）回应道：“作为一名来自东海岸的移民，我发现俄勒冈州在我居住过的州里是白人比例最高的。曾经我天真地认为，或许非裔美国人没有像先驱者们那样迁移至全美各地，也天真地认为俄勒冈废除奴隶制的投票是进步的标志。”组员们发现，俄勒冈州实际上是作为白人的家乡而建立的。1844 年，俄勒冈州废除了奴隶制，这并非出于政府官员们观念的开化，而是因为白人居民不愿黑人居住在本州内。这些白人已经有了北美原住民与中国人来作为可供驱使的廉价劳动力。1844 和 1849 年，州政府官员曾两次通过立法将准备定居在州内的黑人驱逐出去，而已经定居的黑人被要求离开，否则每六个月便要面临鞭刑的折磨。黑人拥有的财产被合法充公，而对黑人使用私刑迫害的现象则处处可见。时至今日，一些房契条款仍然禁止屋主将不动产出售给非裔美国人或中国买家。美国国内一些城镇被视为“日落之城”（sundown towns），意为有色人种不能在夜晚来临时出现在街道上，而俄勒冈州则被称为“日落之州”（sundown state）。三 K 党直到 20 世纪晚期仍对俄勒冈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政治环境已然改变，但俄勒冈州的白人比例还是居高不下。来自其他州的移民并不了解俄勒冈的历史，而这次展览便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他们首次聚焦于美国种族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其实，俄勒冈在这一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比其他州都更为重要。对于该州而言，这次展览的意义重大。为了强调这一意义，展览展出时博物馆设计了额外的项目，尤其是与地方公共图书馆尤金（Eugene）合作，举办了题为“为什么俄勒冈州没有黑人”的对话。

展览结束前的最后几周，俄勒冈大学校园内充斥着有关设计一个“触发预警系统”（trigger warning system）的讨论，意在为任何可能触发学生情绪创伤的课程内容设置预警。然而，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触发行为的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至少有一个学生与一位将观看展览布置成课程作业的教授发生了争执。出于个人原因，该学生觉得展览内容非常令人不安。她说若是事先知道展览的内容，她是绝不会去参观该展的。不过，该教授也没有给出清晰的指导，没有为该生提供“触发警报”（trigger warning）或替代作业。这一时期，校园变得高度敏感，但校方又没有相关措施来应对。这一事件持续发酵，该教授也被指责没有预先对展览进行更为全面的说明。事实上，展览主题的内容简介已经以多种形式发布出来了（如：大学网站、活动小册子、时事通讯和所有的地方报纸），任何学生都可以轻易获取展览的资讯，而展览入口也有相关的资料介绍。不幸的是，这名学生从未看过这些信息，而教授的作业则是要求学生针对展览撰写评论分析。如果教授对展览作出过多的描述，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生的偏见，也会降低此次作业的教育价值。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向学生提供清晰明了的学术指导。类似“触发警报”的问题在全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讨论，这为学术界长久以来期望在教室里探讨的问题带来了寒蝉效应。就挑战性的话题而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是否真的具有教育意义，是否真的可以促进转化性学习呢？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克服一些认知上的偏差（Mezirow 2003）。毕竟，解释博物馆的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意义。大学博物馆不是因为害怕被质疑而自我检讨，而是自己愿意肩负新的使命，将自己改造为辩论挑战性话题的论坛，进而探索这些话题，为大学的学术使命展示其自身的重要性。

展览及其周边活动吸引了大批观众。许多参与讨论的观众纷纷表示，他们会致力于更好地揭示俄勒冈的历史，努力寻求能提升社会平等的种种方式。大学的行政官员、教职员工以及学生都表示，他们认同博物馆作为讨论挑战性话题的“安全地带”（safe place）的价值，认为博物馆为学生们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平台，而且帮助社区组织为社区活动找到了一个乐意的、负责的合作伙伴。最后，施尼策尔博物馆员工也提升了自身的职业素养。在策划这次展览项目的过程中，他们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由此一来，博物馆员工的能力得以加强，而展览合作伙伴和参与者也变得更为多样化。

施尼策尔博物馆的展览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将于全美巡回展出，然而媒体报道还是充斥着手无寸铁的黑人和年轻人（没有说明身份）在圣路易斯（St. Louis）、斯塔顿岛（Staten Island）和巴尔的摩（Baltimore）等地被杀的新闻。警察和白人居民时刻都觉得面临潜在危险，而这些危险其实并不存在，只是大部分群众对此反应过度了。在这些凶杀事件中，受害者以黑人囚犯和无业游民居多，这就证明美国仍未能从奴隶制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虽然大学博物馆无法亲手改变这一现实，但通过像“解放过去”这样较为刺激的展览，这些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论坛，鼓励公众参与到社会变革的相关讨论中。

案例 B：学生策展项目中的冲突性内容

林奇堡学院（Lynchburg College）道拉美术馆（Daura Gallery）是一座教学博物馆，馆内收藏有艺术作品和历史文物。馆藏展览旨在增进学生的学术体验，体现学院的核心价值观并深化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参加学术体验的学生将修读为期一学期的名为“公共维度中的博物馆”（Museums in the Public Dimension）的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为道拉美术馆策划一次展览，从而获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展览的主题已被预先定好，目的在于挑战学生和观众的视角与看法。在开始阶段，博物馆向学生们介绍说，该馆收藏、记录和保护的目的在于理解和增进知识，展品的说明和阐释均是研究的成果，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教育，而观众则包括多种类型的学习者。接着，学生们将考虑策展人要如何为多样化的观众设计有效的讲解说明，同时创造、实施一个原创展览。

2007 年的题为“痛苦的表达”（*Painful Expressions*）的学生展览对当代文身行为进行了解读，尤其是美国帮派团伙、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囚犯的文身行为。虽然本次展览收到了一些消极的反馈，但也没有引起争议。

鉴于大家都比较关注军事历史，2011 年题为“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二战之末”（*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的展览则预见了争议的发生，而学生们也努力设计了非常公允、平衡的学术性讲解。本次展览的文本主要描述了二战中的一些关键战役和协议、文化差异和“三巨头”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冷战的根源。展品包括了照片、明信片、邮票、美国士兵在二战中携带的私人物品等。本次展览的中心陈列品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半身石膏像，由一位林奇堡学院教授为国家诺曼底登陆纪念遗址（National D-Day Memorial site）所创作。展览文本对斯大林的历史角色阐释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批评，但将斯大林半身像放置在展览“引以为傲的地位”这一做法却得到了一些消极的评论。众多批评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信件方式向当地和地区报纸的编辑传达了他们的评论，其中大部分均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的退役老兵。每个学生都需要完成一个任务，即为最激进的批评写一封回信（给当地报纸编辑），然后他们再一起撰写一份回应信，信中将解释展览策划中的决策问题，并发送给当地报纸。

2015 年，学生们又策划了名为“回忆与重现：解构后的迪士尼”（Remembrance & Rediscovery: Disney® Deconstructed）的展览，对动画电影中的社会成见进行了阐释。迪士尼动画电影用商业化的语言讲述神话和民俗故事，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大众娱乐格式。在这个展览中，学生们分析了电影里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归纳为四个主题：性别、局外人 / 他者、经典文本的改编和自我发现的叙述。本次展览最终将四个主题涵盖在内。关于性别的部分，学生们解读了迪士尼电影中性别的代表，包括以下次主题：外表和性格刻画、浪漫、人际关系和对规则的打破等。考虑到迪士尼电影的极受欢迎以及大众情感上的认同，本次展览预见到一些观众可能会对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产生不快，或许会回击说迪士尼电影传达的是积极的美国价值观。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争议是难以准确预料的。唯一的消极反馈来自一封长达 7 页的电邮，其中对“平版印刷”这一术语在展览中的使用进行了评述。学生们也再次得以通过回信任务来思考和回应，并解释本次展览的初衷。

结语

人们很难对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话题作深入探讨，而大学博物馆则可以协助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博物馆独特的价值所在。讨论争议性话题和挑战性话题使得大学博物馆对自身角色、责任和优势都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这就要求对人员培训、项目规划和研究采取新的途径，许多博物馆对此已全然掌握。

高等教育的持续变革同样也要求大学博物馆专业人员采用合适的方法为博物馆创造新的机会来展示学术相关性。大学博物馆作为教学中心和支持学生对问题探究的场所，在管理上给博物馆人员带来了新的要求。展览的同时也必须对自身进行反馈式的检讨，这对一些博物馆管理者来说或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公众积极的和消极的反馈，将之视为博物馆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争议性问题探讨的指标，这样可以帮助减缓解读时的争议和挑战所带来的焦虑感。对争议性问题冷眼旁观、避而不谈，这不是一个可持续采用的策略。

参考文献

Ellison, J. 2010. Controversies in context: Communication, hot topics and museums in Canada. In: *Hot topics, public culture, museums*, eds. F. CameRon & L. Kell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76-193.

Livingstone, P. 2003. *Reading the Science Centre: An interdisciplinary feminist analysis of museum communi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vingstone, P. 2016. Controversy as catalyst: Administrative framing, public perception, and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Canada. In: *Museums and the past: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ds. V. GosselIn & P. Livingstone (Vancouver: UBC Press), 181-205.

Mezirow, J. 2003.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s discourse.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1, 1: 58-63.

Mintz, A. 1995. *Communicating controversy: Science museums and issues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ers.

联系方式

Jill Hartz, Executive Director,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 President,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

Address: 1223,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 97403-1223 - USA

E-mail: hartz@uoregon.edu

Phaedra Livingstone, PhD, Museologist; Secretary, ICOM-ICTOP board

Address: University of Oregon, 1585 E, 13th Avenue, Eugene, OR 97403 - USA

E-mail: iamphaedralivingstone@gmail.com

Barbara Rothermel, PhD, Director, Daura Gallery; Assistant Professor, Lynchburg College

Address: 1501 Lakeside Dr., Lynchburg, VA 24501 - USA

E-mail: rothermel@lynchberg.edu

关键词

Exhibition controversy, Role of the museum, Interpretive programming

策展实验室：一个策展项目的案例研究

Michelle Kuek / 文

摘要

作为大学博物馆，我们的战略目标必然源自大学的战略目标，为大学整体的使命和愿景作出贡献。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发展，让学生为未来做好准备，成为领导全球、服务社会的全才。有基于此，NUS 博物馆设立了诸如实习生项目和策展实验室这样的学生发展项目。本文特别聚焦于“策展实验室”这个策划项目，揭示出其结构演化、挑战、影响和潜能。

引言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文化政策中心（Culture Policy Centre）出具的报告《21 世纪的校园艺术博物馆：一场对话》（*Campus Art Museums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nversation*）中写道，大学博物馆可能遇见的挑战是“不断向所在的院校展示其学术价值，将师生作为核心的服务对象，同时也为更广泛的公众服务”（Shapiro & Al. 2012）。这份报告还收录了 13 座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和博物馆专家的一场对话，他们强调了第二个挑战，即能够在所在院校中产生“学术影响”（Shapiro & Al. 2012）。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罗斯美术馆（Rose Art Museum）则是个反面的例子。该馆于 2009 年被迫闭馆，其主要原因就是博物馆的管理者未能有效地迎接博物馆的上述两大挑战。

上述挑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难题。该校既没有设立美术或艺术史学系，也没有策展或博物馆学项目，也没有其他与艺术有关的学术机构或师资。置身于这样一座大学中的艺术博物馆，想要确保自身与学术学科的有效整合而向大学管理层展示自身的学术价值，着实是一项挑战。不过，除了学术价值以外，大学博物馆能否提供其他的价值或服务来为大学的使命和愿景作出贡献呢？笔者认为，大学博物馆可在学生发展上发挥功用。虽然这与学术价值无关，学生发展正日渐成为大学为学生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每所大学都有责任帮助广大学生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

教育延伸

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始注重学生发展，为此投入了不少资源。可以预见的是，学生度过了数年的大学生活，毕业时将怀着学有所成的荣誉以及一系列的通用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宽泛的知识、跨文化的行效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包容性以及 iNUS 的创新能力、内在复原力、团队合作和正直的品质（Tan 2014）。为了突出这些目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职业中心已转变成了“为未来做准备”的毕业生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教育延伸战略正是遵循着大学的这些目标，设计并强化了学生发展项目。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实习项目和策展实验室就向学生提供了集中策展课程与实习项目。这两个项目所要求的学生水平不同：前者定位在初步了解博物馆工作的学生，而后者则定位在更有经验的、希望进一步钻研策展并开始实践的学生。不过，两个项目都特别设计了不同的活动让参与者采用评判的、发展的方式看待艺术，活动包括辅助的阅读课。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可以参与博物馆的现有项目或开发新的项目，也可以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接触到新加坡艺术、文化和文化遗产等产业。笔者将着重介绍策展实验室项目，阐述其结构的演化、挑战、影响和潜能。

策展实验室：集中策展课程与实习项目

策展实验室项目原本由新加坡艺术委员会（Singapore's National Arts Council，NAC）于 2005 年设计的一项策展教育项目。该项目旨在发展策展领域的知识，树立对策展人角色的正确理解，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策展人在展览制作和新项目开发方面的作用。在新加坡艺术委员会联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承担 2009 版本的项目之前，该项目早先有过 2005 和 2007 两个版本。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又承担了 2012 和 2014 两个版本的项目。

2.1 策展实验室 2009

鉴于本科生阶段策展课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缺失，“策展实验室 2009”项目进行了自身的重新定位，招募对象为大四学生、刚毕业的学生、年轻专业人士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招募有资历的策展人。由于项目并非仅限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我们采取了相关措施，确保本校本科生得以参与。2009 版《策展实验室：100 件物品（混合）》（*Curating Lab: 100 Objects (Remixed)*）的结构和目标设置较为合理，有为期 3 天的工作坊来为参与者介绍策展活动，鼓励参与者采用试验性的方法来为源于新加坡艺术、电影、建筑和文本的 100 件物品策划展览。[1]

1 策展实验室 2009 由菲律宾大学艺术史教授帕特里克・弗洛雷斯（Patrick Flores）、新加坡艺术家兼策展人兼作家张奕满（Heman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策展人阿哈默德・玛莎蒂（Ahmad Mashadi）和林沁怡（音）（Lim Qinyi）领导。

2.2 策展实验室 2012

2012 年，策展实验室扩大成了一个持续 6 个月的项目，以满足人们对策展和博物馆工作不断增长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反映在实习申请和问询的数量上。除了介绍策展概况外，项目目标还包括展示地区艺术界，持续提供策展指导，拓展人脉关系网络，提供策划展览的机会，等等。

与“策展实验室 2009”的实践相反，“策展实验室 2012”旨在带来真正的工作训练，接触到实际的策展活动。重要的是，这一项目成为参与者进阶到策展人位置的跳板。该项目由图 1 所示的 3 个主要阶段构成：

图 1
“策展实验室 2012”项目架构

阶段 1：此为课程学习阶段，学员一开始必须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中策展课程学习，该课程主要介绍当代策展的方方面面，诸如策展人和策展机构、策展写作、艺术＋政治＋行动主义，以及艺术家 / 策展人等内容。[2]

阶段 2：此为实习阶段，参与者到相关机构去当实习生，这些机构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或“未来完成时”艺术画廊。在策展课程理论基础上，学员们将获得实践性的工作技能，参与进行中的展览项目以及探索艺术机构的内在运作方式。参与者还将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Bandung）等地，该行程由万隆理工学院（Band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苏玛嘉美术馆（Galeri Soemardja）联合组织，目的在于了解东南亚地区并将新加坡策展实践结合到东南亚背景当中。

阶段 3：此为设计阶段，参与者必须设计最终展览项目以及管理展览涉及的所有事务，包括预算、行政、装置，以及与艺术家、合作机构面对面工作等。参与者的作品作为 2013 年新加坡艺术周的部分内容于古德曼艺术中心（Goodman Arts Centre）展出。

接着举行公共讲座系列活动“策展圆桌会议”（Curatorial Roundtable），来自不同地区和本地的策展人就不同的策展模式进行讨论。活动还为参与者提供了拓展人脉资源的机会，让公众也得以成为策展实验室的一分子。

2 帕特里克·弗洛雷斯教授和张奕满于 2012 年重新主持策展实验室。第一阶段的推动者包括科斯敏·科斯蒂娜斯（Cosmin Costinas）（香港 Para Site Art Space 董事）和姚嘉善（Pauline Yao）（北京箭厂空间联合创始人）。

2.3 策展实验室 2014

2014 项目的第三版保留了 2012 的结构，但经过内部评估以及分析收集到的大量前师生的反馈后，项目结构发生了两个重要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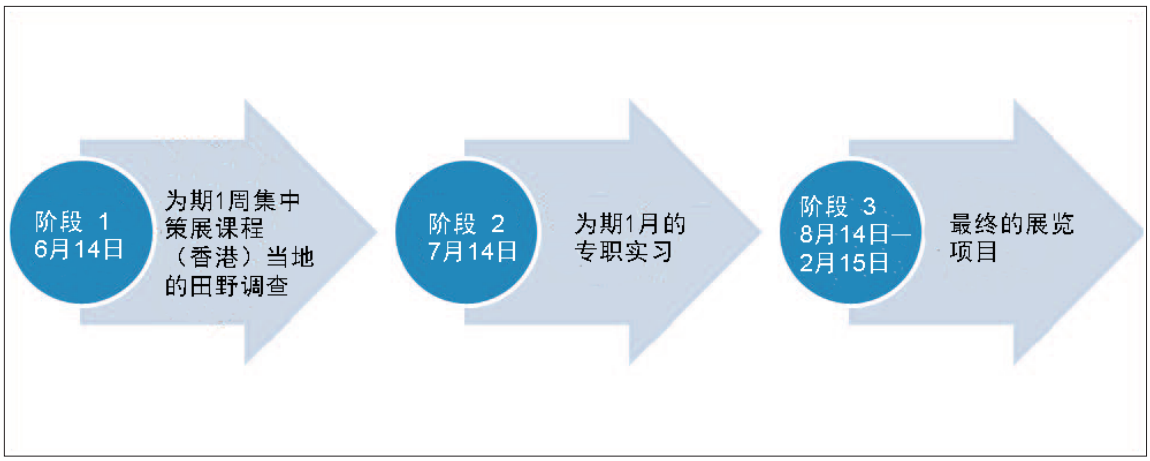

图 2
“策展实验室 2014”项目架构

如图 2 所示，第一个结构改变是重新安排了阶段 2 的地区田野考察，即时跟进策展课程。参与者因而每天碰面，为期两周，增进群体凝聚力；第二个改变是延长最终展览项目的准备时间，使得参与者们可以透过 5 场批判讨论会[3]获得协办人和导师的帮助，集思广益，修改展览提案。

策展实验室的挑战

长达 6~8 个月的时期和我们寻找的特定类型参与者，都为项目带来了若干挑战。本节将阐明两个主要挑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3.1 参与者的义务

项目需要参与者投入大量的时间，他们必须出席所有的活动并为展览做好准备。由于参与者多是全日制学生和工作的成人，策展实验室是他们必须完成的数个任务之一。2012 年，我们注意到若干参与者并没有完全投入到最终展览项目当中，这样给其他参与者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项目申请之初便列出了所有活动暂定的日程安排，昭示项目的工作强度。这一措施使得 2014 年的出勤率有所提升。

实习阶段也出现了缺勤的问题。为此，2012 年我们提供了兼职实习机会，让参与者能够灵活安排时间。然而，这似乎不足以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策展工作，也无法让他们全然投入到任务项目当中。鉴于实习作为实践学习的重要部分，2014 年的实习期变成为期一个月的全职工作。实习被安排在 2014 年 7 月的大学假期，以适应学生们的时间安排。

3.2 项目的驱动力

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如何保持参与者的动力与兴趣对于策展实验室的成功而言极为关键。正如“策展实验室 2014”所述，2014 年的改变之一是地区田野考察以跟进密集策展课程并为实习期做准备。田野考察是一项持续一个半月的活动，需要参与者投入到项目当中。2014 年 7 月实习期结束后，参与者们仍会每两周集合一次进行策展人圆桌会议、展览评鉴和行政汇报等活动。展览截止日期也加入到工作安排中，以确保项目活动的持续进行。这不是像 2012 年那样，仅仅是热热闹闹的短期活动。我们发现，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参与者更好地投入到项目中去，也让我们更好地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为最终展览做好准备。

3 策展实验室 2014 由张奕满、麦克斯·安德鲁斯（Max Andrews）和玛丽安娜·卢娜（Mariana Canepa Luna）（lati, Barcelona）协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NTU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 Singapore）和威尼斯双年展秘书处（NAC Venice Biennale）提供机构指导。

策展实验室的影响

每个阶段结束后，我们都会收集大量来自参与者、导师和观众（公共活动期间）的反馈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些反馈需体现出内容相关度、项目有效性、参与者表现、协办人与导师的能力和有效性，以及项目组织等关键绩效指标。参与者项目前后的策展能力也会得到评估，他们的后续发展也会得到追踪以准确评估本项目的总体效能。

从收集到的反馈来看，我们发现本项目为参与者、参与机构和公众带来了三大影响。

4.1 参与者的职业进步

如我们所望，策展实验室让不少参与者能够在策展和艺术相关的职业路途上迈进一步。有的参与者获聘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国家文化遗产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Board）、独立美术馆（Independent Art Galleries）等机构，或是申请到奖学金而前往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英国皇家美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和荷兰桑德伯格艺术学院（Sandberg Institute）等研究机构，继续从事策展或美术研究。

4.2 人脉关系网

更重要的是，策展实验室为参与者、策展人、艺术家和机构等建立起了新的关系网。参与者之间相互合作，施展专业和个人能力，相互协助共同策划、撰写展览内容或计划，分享机遇并支持对方的实践工作。2014 年的参与者与本土艺术家紧密合作完成展览项目，这份关系一直持续到项目结束，一些参与者还投入到艺术家的个人项目中去。

从机构的角度来看，策展实验室允许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建立或维持与其他艺术机构的合作关系，如帕拉网艺术空间（Para Site Art Space）总监柯斯明・柯斯提那（Cosmin Costinas）就成为策展实验室 2012 的协办人。随后，我们与他合作将帕拉网的“太平天国”（Taiping Tianguo）展览搬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策展实验室 2014 期间，我们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NTU）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CCA）展开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和当代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互相推送双方的展览项目。另外，策展实验室还使得我们与国家艺术委员会（National Arts Council）的关系得以延续发展。

4.3 公众

我们意识到策展实验室获得了高度的关注，而且申请者竞争激烈。为此，我们尽可能地试着为公众创造机会，让他们参与项目并从中得益。除了“策展圆桌会议”系列讲座以外，我们也设置了社交媒体账号让公众关注参与者们的工作进展。内容更新可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和博客（www.curating-lab.blogspot.com）等社交媒体上看到。博客还充当着档案库的作用，未来的观众可以从中获取到过去的资讯内容。参与者也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内容，与公众互动。其他网络平台还包括 Vimeo（活动视频分享）、Flichr（照片分享）、Storify（强化社交媒体帖子内容）和 Peatix（售票网站）等。

结论

我们不断对策展实验室项目进行评估，以优化结构、增加新元素来跟上目前策展实践的脚步。策展写作是一个具有发展潜能的要素，因此参与者们常常被要求撰写展览论文，我们还布置常规写作任务，并就策展写作展开批评讨论会。另一个潜在要素是吸引年轻艺术家的加入，创造策展人—艺术家关系网，在策展实践发展的同时协助艺术家的成长。

通过这三个版本，策展实验室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的学生发展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们教育延伸项目的基石。虽然从中获益的学生数量仅占全校学生的一小部分，但该项目提升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发展项目的丰富度，让学生们发现各自的长处和职业路径，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因而在学术之外也为大学增添了新的价值。

致谢

感谢策展实验室的项目协调人弗洛拉·陶（Flora Toh）（2014），乔林·李（Jolene lee）， 斯蒂芬妮·王（Stephanie wong）（2012）与我一起执行这个项目。如果没有他们在项目管理、设计和写作方面的精力和技能，策展实验室就不会有现在的成果。我还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物馆馆长阿哈默德，为实验室的运营管理提供指导和信任。最后感谢国家艺术委员会慷慨的资助，以及对策展实验室三年项目的支持。

参考文献

Shapiro, T., P. Linett, B. Farrell & W. Anderson 2012. Campus Art Museums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nversation. https://culturalpolicy.uchicago.edu/campus-art-museums-21st-century-convers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5).

Tan, C.C. 2011. *State of the University address: "Sky-pointing" and changes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Lecture presented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ctober 2011.

Tan, C.C. 2014. *State of the University address: Influencing the future*. Lecture presented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ctober 2014.

联系方式

Michelle Kuek, Manager (Outreach &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Museum

Address: 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 50 Kent Ridge Crescent, Singapore 119279

E-mail: michellekuek@nus.edu.sg

Website: museum.nus.edu.sg

关键词

Education, Outreach, Student Development

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苏瓦市纳塞塞海岸的斐济群岛海岸收藏的案例分析

Suratissa Dissanayake M. / 文

摘要

通过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NHM），可以增强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情感积极性。自然历史博物馆可以举办多种活动，可以运用不同的技术、鲜艳的自然生物海报和讲座等（例如动植物的展示），来实现其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所有这些都可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的成果。

斐济群岛（The Fiji Islands）坐落于太平洋（The Pacific Ocean）上，位于南纬 18°00’ 与东经 175°00’ 之间，土地总面积为 18 270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面积为 853 平方公里。2014 年 4 月—9 月，斐济国立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NHM of Fiji National University）采取带状取样和随机调查法，对苏瓦市纳塞塞海岸（Nasese Shore）上的 6 大门类 210 种动物进行了收集采样，将所获动物样本以干湿两种状态保存在博物馆内。纳塞塞海岸物种的主要威胁来自人类对沿海物种的过度捕捞、出游船只的增加、其他休闲娱乐活动和废物处理等。本次调查的结果将提升学生和公众对自然环境威胁的认识，提醒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斐济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斐济国立大学里的角色

斐济国立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落成于 2013 年 12 月，当时我曾作为博物馆技术和策展方面的助理教授协助建馆工作。在斐济国立大学服务的一年半期间，这所大学终于建成了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座全新的大学博物馆收藏了斐济栖息地中的脊椎和无脊椎动物类群，以湿润标本和干燥标本的两种方式陈列展出。这些展览包括保存良好的骨骼标本，以及精确的科学知识（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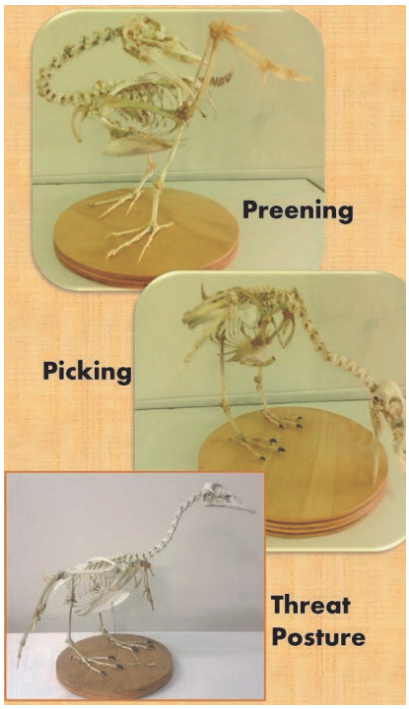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行为姿势的鸭子标本
（斐济国立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在研究过程中，我收集了不同种类的贝类腹足（shell-bearing gastropods）动物。经过识别后，大部分活标本被放归于纳塞塞海滩的自然栖息地。然而，有一些作为湿润标本的动物仍保存于 10% 质量浓度的福尔马林（formalin）中，作为陈列品在博物馆里展出，以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通过贝壳采集到的腹足动物则以干燥状态保存，放在玻璃箱里展示。我根据相关的图像确定腹足动物标本，为陈列准备了大量的宣传海报。

博物馆展出的研究型收藏为许多面向本科生和高中生的教育项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斐济各地的展览旨在唤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行动，而生物标本也成为研究参考的一部分。[1]

引言

2011 年，斐济环境部（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发表了一份名为《斐济综合海岸管理框架》（*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the Republic of Fiji*）的报告。报告指出，斐济的 1 130 公里海岸线、覆盖 31 000 平方公里的斐济群岛沿海以及近海水域，仍处在原始环境中。报告还指出，由于不断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膨胀，斐济的沿海环境正面临着威胁。如果要发展旅游业、农业、林业、渔业等以及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政府必须制定一套健全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国家层面需要采取重大措施来保护沿海生态系统。据估计，有 76% 斐济人居住在主岛周边 30 公里的礁石上（Burke et al. 2011）。因此，在考虑合适的管理和保护措施时，就必须将斐济沿海湿地海洋生物区的基线数据考虑进去。

斐济的首都是苏瓦市（Suva），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潮间带湿地生物的多样性资源，这些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图 2），其中包括纳塞塞海滩的研究基地。

1 参见斐济国家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在线视频：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nxUXioiR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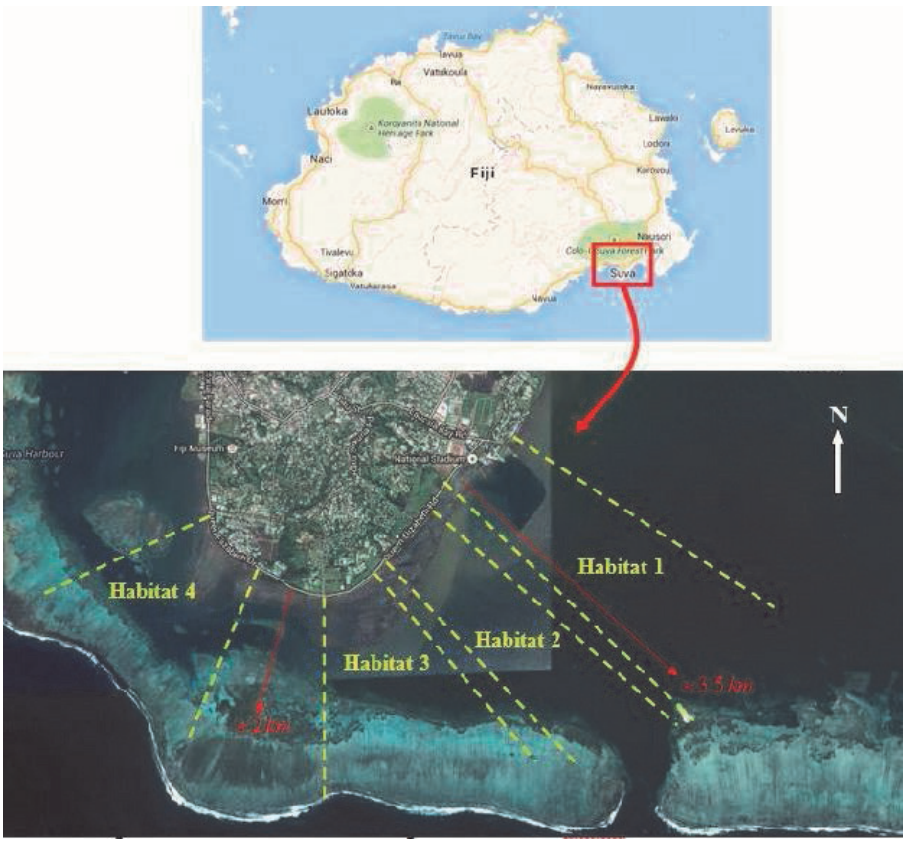

图 2
苏瓦市纳塞塞海滩研究基地选址
（栖息地 1、2、3、4）

斐济的深海物种相比浅海更为丰富，沿海区域的物种也比远洋更多样化，其原因在于这里存在着大量的近岸栖息地（Gray 1997）。然而，沿海多样性系统在不断衰退，成为严重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沿海栖息地的盲目利用所致。早在 1991 年和 1992 年，欧西利（Ehrlich）、威尔逊（Wilson）、雷文（Raven）等学者就表示，斐济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亟待完成。如果要探明整个地球的生物数量，则需耗费无限长的时间。针对这些问题，自然历史博物馆显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些博物馆能以许多方式向广大公众传达这方面的信息。2004 年，温克（Winker）提出，自然历史藏品的使命是记录生物多样性，并作为研究和教育的资源来使用。

斐济沿海生态系统面临着众多威胁，主要包括栖息地消失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过度捕捞鱼类、有机物无机物等造成的沿海污染、富营养化、致病细菌和藻毒素、放射性核素、分水线和海岸线变化、旅游业、海洋垃圾等等（Fluharty 1994，Norse 1994，Sebens 1994，Suchanek 1994）。利益相关者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知识与意识的缺乏，也是一个主要的威胁。这些威胁通常有着内在的关联。比如，过度使用炸药和化学品捕鱼造成的沉积，会导致礁石减少（Gray 1997）；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日趋恶化，反过来影响了旅游业；陆地排水系统的垃圾、沙滩垃圾、渔船垃圾等也是常见污染源（UNEP 1991）。需要指出的是，几乎多达 75% 的垃圾都属于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和发泡胶、金属、玻璃和木料，而这些材料尤其会影响到海龟的生存（UNEP 1991）。我们尤其缺乏斐济潮间带生物资源方面的知识和量化数据。因此，本研究试图对所选海洋生物的丰富度、密度和分布进行量化，为未来海岸资源的管理提供参考。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明纳塞塞海滩所选栖息地中的物种分布、种类和密度，并将资料保存于斐济国立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为未来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众意识项目（public awareness program）提供助力。

材料与方法

2014 年 4 月—9 月，我们研究了斐济群岛苏瓦市纳塞塞海滩的动物多样性和分布，采用了带状取样统计法调查物种丰富度和动物数量。我们在每种栖息地中分层随机设置了宽 5 米、长 300 米的三条取样带，通过随机观察的方法（Anderson & Pospahala 1970，Sutherland 1997），确定了所选栖息地的物种丰富度。例如，我们考察了当地渔民的捕获情况，借此调查栖息地的鱼类种类。栖息地按照基质类型分为沙地（S）、岩地（R）、泥地（M），并以红树林 / 沙地（MNS）、泥地 / 沙地（MS）、岩地 / 珊瑚（RC）归类。自 2014 年 4 月—8 月，我们在涨退潮期间进行了采样。4 个栖息地都受到潮汐类似的影响，但内河入侵的影响则不尽相同。我们采取了分层随机采样法在潮间带选取样带（取样地如图 2 所示）。我们采用沙农 - 维纳（Sha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来表示每个栖息地的物种多样性，用克鲁斯卡尔 - 沃利斯检验（Kruskal-Wallis）来对比 4 个栖息地中不同物种的数量和密度。随机数据仅用于表示物种丰富度，为每个栖息地建立物种目录。

结果与讨论

动物的多样性

经过 6 个月对 4 个栖息地 300 个取样带的研究后，我们得出了 4 个栖息地总共 210 种动物物种，分别属于以下 6 个门类：刺胞动物门（Cnidaria）、环节动物门（Annelida）、软体动物门（Mollusca）、节足动物门（Arthropoda）、棘皮动物门（Echinodermata）和脊索动物门（Chordata）。

表 1 四个栖息地物种的丰富度

	研究期间记录所得动物物种丰富度			
动物种类	沙地/岩地/泥地（栖息地 1）	红树林/沙地（栖息地 2）	沙地/泥地（栖息地 3）	岩地/珊瑚（栖息地 4）
刺细胞动物	1	0	0	15
环节动物	0	0	0	1
节足动物	3	5	0	5
双壳动物	5	3	5	15
腹足动物	16	13	4	78
双神经动物	0	0	0	1
棘皮动物	0	0	1	12
鱼类	0	8	1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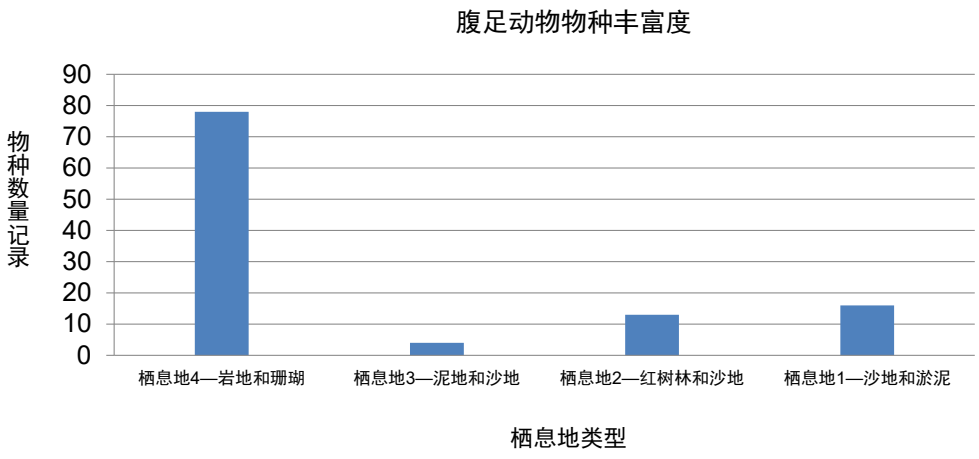

表 2 四个栖息地腹足动物的丰富度

物种密度最高的是岩地 / 珊瑚带，远高于其他栖息地（（41.6 ± 0.16）个 /1 000 m²；克鲁斯卡尔 - 沃利斯检验值 H=14.23，P<0.05）。泥地 / 沙地栖息地物种密度则远低于其他栖息地（（1.2 ± 0.03）个 / 1 000 m²；H=28.14，P<0.05）。就物种多样性和数量而言，最有利的栖息地是岩地 / 珊瑚带，微环境极为丰富。并且，我观察到岩地 / 珊瑚栖息地有海草可支持物种多样性和数量。

腹足动物数量在所有栖息地中都远高于其他门类（（23.4 ± 0.63）个 /1 000m²；H=56.47，P<0.05），而鱼类和双壳软体动物数量则位居第二和第三。除了海百合类之外，几乎所有的无脊椎动物都能在岩地 / 珊瑚带找到。通过随机观察法，我们只获得了 5 种鸟类记录。滩涂鱼在红树林 / 沙地中的密度远高于其他栖息地（H=24.4，P<0.05），这或许说明栖息地的污染情况。沙农 - 维纳多样性指数显示，岩地 / 珊瑚带拥有最高的物种密度（H=0.713），而泥地 / 沙地最低（H= 0.106）。SRM 和 MS 栖息地指数分别为 0.115 与 0.262。

污染等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

研究期间，我们在纳塞塞海滩观察到许多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捡取海洋生物作为食品（如：贝壳、捕捞腹足动物、棘皮动物）、驾摩托艇驶过珊瑚礁、玩橄榄球、扔垃圾、用拖网和长排网捕鱼等等。由于对棘皮动物（海参海胆）、腹足动物（海螺）、双壳动物等的过度捕捞、售卖与消费，这些动物很可能会逐渐消失。本地物种的灭绝会影响食物链，导致其他物种的消失。一般来说，采集捕捞都是由本地 13~15 个家庭完成，每天售卖这些海产品能挣到 20~100 斐济元（图 3、图 4）。

图 3 苏瓦市场上售卖海胆

图 4 苏瓦市场上售卖海螺

这一地区的拖网捕鱼使用了尺寸不合的传动装置，渔民们捕获成年鱼类，较小的鱼则被丢弃在岸边，这些渔民每天卖鱼所得为 50~120 斐济元。

事实上，美丽的海螺、海胆、黑带海参和双壳类螃蟹等物种都受到了过度捕捞的严重影响。摩托艇会伤害珊瑚，玩橄榄球等娱乐活动则会破坏招潮蟹的栖息地。

岸边丢弃垃圾是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主要现象。多数食物包装、塑料容器、水瓶和聚乙烯材料通常都会被潮水带走，垃圾随之被带到了深海区，进而影响到其他栖息地。摩托艇对珊瑚的伤害则导致珊瑚数量骤减，使土地被海洋洋流侵袭。

海岸污染是物种多样性面临的关键问题。纳塞塞的数条河流都汇聚海岸，其中大多数似乎未被污染。不过，一些河流中含有工厂、餐厅和居民楼的污水，这些污染物更容易改变某些动物的比例（如：带壳腹足动物），而不是造成物种数量的显著变化。为了观察这些变化，我们需要开展 2~3 年的研究。除了岩地 / 珊瑚以外，其他栖息地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可能是由于河流带入海洋的有毒化学物和污染物造成的（Upaka et al. 2014）；而岩地 / 珊瑚栖息地大量的死珊瑚，则可能是由于内河带入海洋的磷氮化合物所导致的。

结论与建议

（1）尽管受到污染和其他人类的影响，纳塞塞海滩仍保持着潮间带物种的丰富多样性和数量，其中包括一些罕见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

（2）通过本次调查，我们为将来对物种资源的管理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信息库。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3）定期监察纳塞塞生物群的数量、密度和分布以及环境质量，还应当考虑其他环境参数；

（4）必须开展一项对微生态环境分布的深入研究，以解释潮间带物种数量、密度和分布的差异；

（5）必须让政府部门意识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通过法规来保护物种多样性不受过度开采之害（如合适的捕鱼装置）；

（6）必须通过为摩托艇设立适当的通道或准入禁令，来管理珊瑚礁区域的摩托艇；

（7）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行动，停止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进海洋；

（8）环境部门可以通过宣传活动，减少人们往海洋扔垃圾的现象；

（9）建议与社区一起开展红树林保护项目；

（10）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角色在于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来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如发布环境问题的信息、展出海报和动物展品、在公共展览空间应用不同的保护和展示技术，等等。这些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建立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健康关系。

致谢

我要衷心感谢 P.N. 达亚万萨博士（Dr. P.N. Dayawansa）、迪帕克·迪内什·昌德（Deepak Dinesh Chand）以及其他帮助我成功完成这项研究的人。我还要感谢斐济国立大学前任副校长和现任代理副校长伊恩·劳斯教授（Ian Rause）帮助和支持斐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设。

参考文献

Anderson, D R. & S. Pospahala 1970. Correction of bias in belt transects of immotile objects.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34, 1: 141-146.

Burke, L., K. Reytar, M. Spalding & A. Perry 2011. *Reefs at risk revisited*.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2011. Coastal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the Republic of Fiji. Fiji.

Ehrlich, P.R. & E.O. Wilson 1991. Biodiversity studies: Science and policy. *Science* 253: 758- 762.

Fluharty, D.L. 1994. Coastal management: New global concern. *Forum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9, 1: 53-58.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the Republic of Fiji 2011. Fiji.

Gray, J.S. 1997. Marine biodiversity: Patterns,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needs.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6, 1: 153-175.

Norse, E.A. 1994. *Global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Raven, P.H. & E.O. Wilson 1992. A fifty year plan for biodiversity surveys. *Science* 258: 1099-1100.

Sebens, K.P. 1994. Biodiversity of coral reefs: What are we losing and why? *American Zoologist* 34: 115133.

Suchanek, T.H. 1994. Temperate coastal marine communities: Biodiversity and threats. *American Zoologist* 34: 100-114.

Sutherland, W.J. 1997. *Ecological censes techniques. A Hand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EP 1991. *Regional Seas Reports and Studies* (Nairobi), 136.

Upaka R., D.M. SuratIssa & C. Deepak 2014. Water quality analysis in Nasese Bay, Suva, Fiji. *Water* 187: 18-27.

Winker, K. 2004.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a Postbiodiversity Era. *Bioscience* 54, 5: 455-459.

联系方式

Dissanayake M. Suratissa, B.Sc (Hons) Zoology, PG Dip in Archae (Merit), Ph.D in Paleobiology

Address: Department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Colombo, Colombo 03, Sri Lanka

E-mail: suratissa@yahoo.com

关键词

Natural History Museum, Biological diversity, Fiji Islands